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後冷戰時期的日美關係

doi:10.30390/ISC.199307_32(7).0002

問題與研究, 32(7), 1993

Wenti Yu Yanjiu, 32(7), 1993

作者/Author：張隆義

頁數/Page： 11-2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07_32\(7\).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07_32(7).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後冷戰時期的日美關係

張 隆 義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長期以來在國際舞台上沒沒無聞，唯美國馬首是瞻。在對外政策、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均採取追隨美國的方針。日本對於國際事務並不熱心，只借助美國核傘保護，傾全力於發展經濟，而逐漸發展成經濟大國。

從國民生產總值來看，一九五〇年日本僅為美國的百分之五，而到一九八九年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四，一九八七年開始，日本的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美國。一九八九年底日本債權達四千億美元，美國則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為最大的債務國，當年美國的外債共為六千四百二十億美元。^①同時一九八九年日本也取代美國成為提供對外援助金額最多的國家。^②日本已經成為經濟大國、投資大國、貿易大國和金融大國。

在冷戰時代美國的軍事居於全球的優勢地位，但長期以來為國際安全保障，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以致在技術和經濟方面的競爭能力，有趨於下降的傾向。這種競爭能力的下降，使美國擔心，能否繼續維持世界強國的地位。而在國際安全保障上，沒有付出應有的努力的經濟大國，如日本、德國，反而加強了他們的競爭能力，美國乃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而感到委屈，屢次要求日本應該負起與其國力相配的國際社會的責任。^③

在美蘇對抗的冷戰結構下，美國只集中精神考慮如何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但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軍事威脅也因而消失了，而一向標榜以武力制衡政策的共和黨，在冷戰後也逐漸喪失了它的魅力。美國國民開始把眼光集中在經濟問題的改善上

註① 王滬寧，「九十年代日美關係的矛盾結構」，復旦學報（上海），社科版，一九九二年四月，第二一—二七頁。

註② 朝日新聞，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三頁。

註③ 豬口孝，「宮澤・クリントン會談にみる日米關係の歧路」，エコノミスト，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一日號，第四四—四七頁。

。隨著冷戰體制的終結，日美之間的經濟貿易摩擦日益嚴重。美國方面已經強烈地意識到原來作為美國敵人的蘇聯解體後，迅速崛起的經濟大國日本已經成為美國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④

在這種背景下，今（一九九三）年初當上美國總統的柯林頓承諾要消除貿易不公平，加強美國的競爭力，熱心於促進外國的市場自由化，同時主張對於不公平貿易國家採取保護主義的報復措施。

美國與亞太地區的貿易早已超越美、歐的數額，估計在西元二千年時，其差距將達兩倍。而美國外貿逆差大都來自東北亞國家，因此貿易問題將成為美國與亞洲國家關係的主要議程。尤其美國對日貿易逆差將近五百億美元，成為美國急欲改善的問題。

在冷戰結束以及美國民主黨新政權成立之後，柯林頓總統對於日本的經貿政策，將採取何種新措施？對冷戰體制下的日美安保體制，以及國際政治的分擔要求是否有重大改變？這便成為日本所最關心的課題。

二、日本探索與美國的新關係

日本政府在去年（一九九二）年預測柯林頓將會當選下屆美國總統時，即開始評估柯林頓未來的政策動向及日本的對策。在柯林頓入主白宮前，曾表示將會對境內外國公司課以重稅，日本在美國的公司很多，此舉直接關係到商業利益。美國的能源政策及環保政策，對外國也很有影響，美國在這方面的未來動向值得注意。柯林頓對外匯政策的看法，美元的升貶直接關係到對外貿易，對日圓的匯率更是重要；柯林頓的一位智囊曾經表示，美元與日圓的匯率應維持在一美元比一百至一百一十日圓的水準，果真如此，則日圓將大幅升值。^⑤

日本對於民主黨政府會不會改變日美安保條約的既有架構，會不會要求日本對駐日美軍的經費，做更大的負擔，是日本所關心的。而日本最擔心的仍是美國對外貿易的手段，惟恐柯林頓政府援引貿易報復條款來對付日本。

國際形勢的劇變，日美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而柯林頓總統對日本的多次指責，又使東京感到格外緊張。宮澤內閣為探索與策劃新形勢下的日美關係，於是在今年二月中旬，派當時的外相渡邊美智雄前往華盛頓，同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國務卿克里多福等舉行會談，想在新政府的對日政策尚未定型之前，溝通雙方意圖，力求緩和兩國間的經濟摩擦，為

註④

松永信雄，「クリントン政權の誕生と日米關係」，自由民主（月刊），一九九三年二月號，第五〇～六四頁。

註⑤

「日本所擔心於柯林頓者」，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第七頁。

今後日美關係營造一個良好的氣氛。^⑥

渡邊外長二月十一日赴白宮拜會時，柯林頓總統對渠強調稱：「日美關係乃最重要之兩國關係」，「我比美國歷代任何總統都尊敬日本」，「國內問題不克解決，即不具備在外國為所應為之先決條件」，說明美國將以重整國內經濟為當務之急，所以日本實有開放國內市場及擴大內需，以解決日美間貿易失衡問題之必要，並提及美國貿易法超級第三〇一條款復活問題，意圖促使日本盡力減少對美貿易順差。

渡邊外長則首先提出日本擬以日美安保條約為基礎，加強雙方合作關係之想法，並轉達宮澤首相將用以避免日美間發生經濟摩擦之四項方針：（一）正研討資金回流發展中國家之新計畫；（二）將努力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及開放市場；（三）七月召開之七大工業國東京高峰會議將協商實務性內容；（四）建議美方超級三〇一條款之復活並非善策。^⑦

在柯林頓新政府尚未確定對日政策之前，向美國轉達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擴大內需的積極姿態，同時確認美國的對日政策是渡邊此次訪美的主要目的。

在確認日美同盟關係這一點上，日本如願以償地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但是在經濟問題上卻領教了新政權嚴厲的態度。

在二月十一日柯林頓會見渡邊時，柯林頓突然表示必要時將採取迫使對方開放市場的超級三〇一法案，這一強硬姿態令當時在場的日本外交官員吃驚不小。其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財政部長班森也用不同的表現方式，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意思，就是美國對日貿易赤字是兩國間存在的最大問題，日本應擴大內需，開放市場。

克里斯多福更是直接把矛頭對準日本大米市場，明確要求日本允許美國大米進入日本市場。

面對這一系列緊逼不放的表態，日本終於明白如果拿不出令美國滿意的對策來，日美關係仍會趨於緊張。^⑧

爲了再度協調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宮澤首相乃決定親自前往華盛頓與柯林頓會晤。在四月十五日宮澤啟程訪美之前，日本政府爲了替宮澤的訪問鋪平道路，於十三日宣布了一項價值一千一百六十億美元（十三兆二千億日圓）的龐大的經濟振興計畫，旨在恢復日本的經濟活力，同時增加從美國等國的進口，縮小日本跟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順差，從而帶動世界經濟復甦。日本官員估計，這項刺激經濟的綜合景氣對策，可以使日本今年的進口額增加八十億美元。他們還透露，日本今年可能從美國購買更多的半導體和其他高科技產品。^⑨

註⑥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第四頁。

註⑦ 朝日新聞，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三日，第二頁。

註⑧ 「評渡邊外相美國之行」，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第二四頁。

註⑨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四日，第一頁。

另外，在十四日於東京舉行之先進七國（G七）財政部長級會議，宮澤表示日本願提供對俄羅斯經濟援助，包括三億二千萬美元無償貸款及十五億美元有償貸款，計十八億二千萬美元之援助，^⑩以一掃美國認為日本不願全力支持俄羅斯之誤解，表示日美兩國協調關係已趨加強。^⑪

宮澤首相為確認與美國在安全保障及經濟問題上之同盟關係，四月十五日抵達美國，翌日上午即與柯林頓總統舉行雙方上任後首次之首腦會談。會談結束後，下午並舉行聯合記者會，發表新聞。會談主要內容如下：^⑫

（一）雙方同意事項：（1）日美安保條約及美國維持在日駐軍，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安定；（2）烏拉圭回合有必要獲得實際的成效；（3）雙方將於三個月內設立「經濟協調機關」，以因應經濟結構及個別貿易項目問題。

（二）美方表示事項：（1）擔心日本貿易出超及市場開放不夠充分，要求市場開放應採明示目標的方式；（2）日本所採刺激景氣方策為擴大內需之第一步，應繼續努力；（3）日美在支援俄羅斯、中東、索馬利亞及柬埔寨之和平工作上之合作極為重要；（4）支持日本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三）日方表示事項：（1）憂慮美國運用綜合貿易法案三〇一報復條款；（2）日本將努力擴大市場開放，惟反對美國形同管理貿易之要求明示目標的方式。

柯林頓在會談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向首相強調，我特別關切日本日益擴大的對外投資等項目和貿易順差，並深感關切美國企業、產品和投資者進入日本市場的不足。」「商品在日本市場比在我國市場銷售更難。美國將要接受改革的挑戰，而日本也必須如此。」

宮澤則說，他同意有必要繼續作出努力，增加日本市場的開放。不過他對美國日益增加的保護主義呼聲，表示「嚴重關切」。宮澤說：「我向總統強調，我國經濟繁榮是建立在我們獨特的經濟互相依存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本著合作精神支持這種關係。」^⑬

過去日美會談基本上主要是彼此強調兩國在全球性的夥伴關係與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對於兩國間存在的懸案，只是抽象地加以論述，然後留給事務級官員去具體交涉。但是，在這次會談中，日美首腦卻在兩國的經濟和貿易關係方面展開了面對面的交鋒。

註⑩ 每日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四日，第一頁。

註⑪ 每日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第二頁。

註⑫ 讀賣新聞（晚刊），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一頁。

註⑬ 讀賣新聞（晚刊），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三頁。

在日美首腦會談和其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柯林頓對日本貿易盈餘的擴大坦率地表示憂慮，並且明確地提議，日美之間應設立綜合性的經濟協商機構，並在各領域規定明確的市場開放目標。宮澤認為柯林頓的要求反映出美國要對貿易進行管理的傾向，而強烈抗拒說，單方面的「威脅」是達不到目的的。^⑭

經過這次首腦會談，顯示出冷戰後，美國急欲與日本改善經貿關係，而成為最重要的課題。

三、雙方貿易摩擦的激化

隨著冷戰體制的終結，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益嚴重。美國方面已經明顯地意識到，原來作為美國敵人的蘇聯解體後，迅速崛起的經濟大國日本已經取代蘇聯而成為美國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一九六〇年代先進工業國有顯著的經濟成長，尤其是日本的年平均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大幅成長，而美國在越南戰爭的龐大支出，使美國經濟的國際地位相對地降低，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減弱，一九七一年國際貿易收支方面，美國由出超轉為赤字。以日美兩國的貿易關係來看，一九六四年以後日本已轉為出超，一九七一年約有三十億美元的對美出超紀錄。

^⑮

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新經濟政策及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使日本對美貿易出超緩和下來，但到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景氣恢復後，日本對美出口就急速增加，一九七八年出超就突破百億美元的大關。一九八〇年代日美經濟摩擦更形多樣化、複雜化，成為兩國關係的課題。而在美國經濟體質沒有根本改善的情形下，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均衡，依然沒有大的改變。^⑯一九九二年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美對日貿易逆差達四百九十四億美元，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點九。^⑰

美國柯林頓新政府上台後，開始要求日本具體地執行削減對美的貿易順差，不然將以實施貿易制裁對付。

美國要求日本在日本市場上明示外國產品的進口目標和所占的比率。在半導體產品方面，一九九二年底，在日本市場的外國半導體產品達到日美半導體協定的百分之二十的目標，美國要求一九九三年仍維持年平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率。汽車及其零件，一九九一年自美進口一百五十億美元，一九九二年上半年為六十億美元，美國要求一九九四年提高到一百九十億

註⑭ 產經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第四頁。

註⑮ 細谷千博，日本外交的軌跡，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九三年，第一八六頁。

註⑯ 同註⑮，第一九四頁。

註⑰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四日，第三頁。

美元。美國也要求日本國立大學及研究機關擴大對美製超級電腦的採購，對牛肉、柑橘等農產品市場的開放更進一步努力，改善金融服務業等閉鎖的市場，修改專利法及禁止獨占法等以改善進口障礙。¹⁸

美國對日本強硬的態度，引起日本的不滿。二月間日本外相渡邊訪美回國在國會表示，日本已經通知美國，如果美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日本可能採取適當的對策加以報復。¹⁹

四月十六日宮澤與柯林頓會談時，對美國在各產品部門設定目標值以改善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也表示以管理貿易或片面的措施之威脅，並不能獲得改善，而加以拒絕。²⁰日本政府內部認為日美貿易不平衡原因不在於日本，而是美國缺少競爭能力。日本新任外相武藤嘉文說，日美兩國可以在宏觀經濟方面進行討論，日本方面同意設立綜合性的經濟協商機構，而不贊成在一些工業領域設定市場目標值。日本商界也都以美國的要求違反自由貿易的原則，而表反對。日本重要報紙也都發表評論，表示對美國的這項要求加以拒絕是理所當然的。²¹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與宮澤會談後，對記者表示，日圓升值對美國來說是可以容許的。之後，日圓在國際貨幣市場不斷升值，令日本財政金融界極為困擾，因為柯林頓這番話等於鼓勵日圓升值，於是各地大拋美元，狂吸日圓。展望不久的將來，日圓大有可能升至一百圓兌一美元。日本藏相林義郎表示，日圓升值不僅影響日本經濟景氣的恢復，在短期內還會使日本的貿易出超增加，影響日本擴大內需。日本政府指責美國財政當局以調整匯率手法期望能改善對日貿易逆差想法並不適當。²²

對美國的不斷施壓，日本已開始採取漸趨強硬的態度。日本通產省的諮詢機關產業結構審議會，於五月十一日提出一九九三年度的不公平貿易報告書，調查日本的十個主要貿易國家，是否採取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和管制措施。結果在十二項目中，以美國占有九項為最多，其次為歐洲共同體(EEC)和南韓各占六項次之。此一報告自去年開始，這次是第二次報告，由通產省送給有關國家，要求改善，美國的防止傾銷措施的濫用，貿易法第三〇一條的片面措施，隨意變更關稅分類以提高稅率等為其代表性的問題。在結論部分表示，為了消除不公平政策，烏拉圭回合的早日獲得成效為不可或缺缺的條件。²³

柯林頓提出的設定市場目標值的建議遭到日本的抵制，日圓升值能否糾正日美貿易不平衡也難以預料；自一九八五年以

註18 讀賣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第九頁。

註19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第一頁。

註20 產經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第四頁。

註21 朝日新聞，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社論，第二頁。

註22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十頁。

註23 朝日新聞，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第一及十一頁。

來，日圓已經數度升值，日本貿易順差卻越來越大，這次也未必會出現奇蹟。在日美矛盾加深的情況下，雙方貿易摩擦的激化將是不可避免的。

四、安保同盟關係的存續

日美安保條約是在「冷戰」的國際戰略環境下的產物。一九五二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南北韓戰爭時成立，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的亞洲政策，從朝鮮半島擴大到中南半島，為軍事介入戰略的範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中共及國際共產主義勢力在各地所發動的顛覆活動，也是美國所急欲防止的。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長期化、越南戰爭的介入等亞洲地區冷戰的發展，使得日美安保條約具有重要的意義，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前提條件。

八〇年代在遏阻蘇聯勢力擴張的情勢下，美蘇在北太平洋配備潛艇發射彈導飛彈，進行核子對抗，使日本周邊的海空成為爭執的舞台。安保條約也就從「基地提供型」、「後方支援型」轉變為自衛隊和美軍的共同作戰，統合運用為基礎的「共同對抗蘇聯型」，在「蘇聯的威脅」的口號下，「不沉的航空母艦」、「封鎖三海峽」、「海上航路一千海里的防衛」等，也藉著安保合作的名義，自衛隊的經費有大幅度的成長，自衛隊的活動範圍也擴大到了外洋。^{②4}

然而，一九八九年象徵東西方對立和冷戰的柏林圍牆頃刻崩塌，而東歐共黨政權更像骨牌般一個接著一個解體，轉瞬間改寫了東西方關係的歷史，戰後兩極化的國際政治體系，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一九九一年蘇聯的解體，更使戰後美蘇對抗的局面不復存在。

日美安保條約是在美蘇對立的冷戰體制下產生的，在冷戰架構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本來應該對日美安保重新檢討，對軍事同盟重新評估，但是在日本雖然修改憲法的論調有高漲之勢，對日美安保卻鮮少有要求改變的動向。^{②5}

在今年四月十六日柯林頓與宮澤會談時，雙方也再度確認了同盟關係。柯林頓強調「與日本的戰略同盟及政治合作將繼續下去」；宮澤也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及日美安保條約，是此一地區安定的重要因素。」^{②6}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日美安保條約的假想敵消失了，軍事同盟的目標已不明確，為何雙方政府都沒有要求修改或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的論調呢？這倒是值得我們加以思考的。

註②4 前田哲男，「世界的現狀と日米安保條約」，軍縮問題資料，一九九二年六月號，第十六、十七頁。

註②5 宇都宮德馬，「今こそ日米安保再檢證の時」，軍縮問題資料，一九九三年六月號，第二頁。

註②6 讀賣新聞（晚刊），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第一頁。

以日本方面來說，日本表示，在一九八九年以後，以歐洲為中心的變化，對整個亞太地區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雖然在遠東地區也出現蘇聯軍力的裁減、南韓與蘇聯建交、南北韓對話並同時加入聯合國以及蒙古的民主化運動，但這些變化之影響卻很有限。冷戰後亞洲出現不穩定的情勢，地區的紛爭更容易產生。而俄羅斯繼承了舊蘇聯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大部分兵力，依然是個軍事大國。北韓的開發核武的企圖，以及蘇聯解體後，各共和國核武的管理問題，亦隱藏著不安。²⁷

日本官方所發表的防衛白皮書，自蘇聯崩潰後，雖然不再提「蘇聯的威脅」，但也開始強調亞洲地區的「不安定因素」，提到一九九二年二月中共的「領海及毗連區法」宣告擁有釣魚台及南沙群島以及中共為加強海軍力量大幅增加國防經費，並初次將台灣的軍事力量列項說明。此外，還特別強調日本周邊地區的情勢複雜，中共、南韓、東協等區域內各國都在致力充實國防力量。²⁸

今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相武藤嘉文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外長」錢其琛會談時，要求與中共就安全問題進行對話。此項建議已獲中共同意，首次會談最快可能在今年七月舉行。²⁹日本認為為本地區的安全，有必要牽制中共增加海空軍力量等擴軍行為，不使其成為亞洲不安定的因素。日本並將敦促中共藉發表國防白皮書及公開軍費內容，以消除日本對其擴軍之疑慮。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政府已開始研究在和中共協商下年度對中共日圓貸款案件時，將準備要求中共削減軍事費用。³⁰

日本堅持安保條約繼續存在，也是基於維繫良好的日美關係之考慮。在冷戰結束後，日美兩國在貿易、經濟方面的摩擦的升高，有加深兩國對立之虞。日本不願在此時對運作良好的安保條約下的防衛合作和美軍駐日經費的分擔上，產生歧見，反倒是想藉著安保條約，維繫日美關係，在駐日美軍經費分擔上，寬列預算。³¹

以美國方面來說，在冷戰結束，蘇聯的威脅消失之後，同樣認為在亞洲仍然存在著朝鮮半島南北分裂所帶來的危機，中國大陸內部存在著動亂的因素，台海兩岸的關係仍不明朗，東南亞也存在著柬埔寨的問題，甚至中東地區也還動亂不安。美國認為如果這些不安定的因素威脅到「美國的安全」的話，美國不可能放棄日美安保條約，不可能放棄在日本的基地及其補給能力。即使美軍不可能長期駐留在日本基地，也將設法能夠有事駐留及有事使用日本基地。³²

註27 森本敏，「九〇年代末に緊迫する北東アジア」，世界週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號，第一〇至一五頁。

註28 森山二朗，「九二年防衛白書」，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二年八月七日，第九頁。

註29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三年五月三日，第一頁。

註30 產經新聞（晚刊），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第一頁。

註31 前田哲男，「世界の現状と日米安保條約」，軍縮問題資料，一九九二年六月號，第十八頁。

註32 原彬久，日米關係の構圖，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九一年，第二一五至二一六頁。

在美國國防部的構想中，是以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北韓、中共、古巴為潛在的威脅國家，評估其戰力而採取對策的。這些國家除西半球的古巴之外，都是包括駐日美軍在內的第七艦隊的行動區域內。如果美國在菲律賓賓等東協各國設置軍事基地或設施，則美國必須負擔龐大的開支，而在日本就不同了。今後日本進一步擴大駐日美軍經費負擔的預算，甚至可能使美國的駐留經費不用負擔。加以日本的技術能力，比美國本土更能獲得完善的補給、修理與保全。因此，僅以財政的理由，要廢除或縮小在外基地的話，美國政府不會將日本部分列入考慮。^{③③}

在冷戰後雅爾達體制的崩潰，日美安保條約的信賴關係必然會下降，安保條約防衛日本的任務逐漸降低，駐日美軍實際上是為保護美國的利益而駐留日本。美國能夠花費很少的代價，在亞太地區維持其地位和影響力，當然不擬改變日美安保體制，乃創造出所謂的「瓶蓋理論」，^{③④}主張美國必須繼續駐留日本，以防止日本重新軍事化。而日本則亦以在美國要求責任分擔下，可以擴大其在國際間的活動空間，而減少鄰近國家對日本的不安和懷疑，日本本身也還需依賴美國核傘的保護，所以重新評估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在意義並不積極。^{③⑤}

五、結語

隨著冷戰體制的終結，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白熱化。美國方面已經明顯地意識到，蘇聯解體後，迅速崛起的經濟大國日本已經取代蘇聯而成爲美國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柯林頓出任美國總統後，把重新振興美國經濟和增強美國企業的競爭力作爲施政的首要課題。

美國在近五十年來自認爲是世界的領袖。在對外關係經驗中，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自認爲美國是全球的超級強國，所以政壇人士和輿論都拒絕接受有任何對手的存在，尤其無法接受一個曾被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的國家當對手。

沒有了蘇聯這個對手兼威脅之後，美國還要在所有區域性和全球性的事務上保有其霸權。根據五角大廈的分析，美國成功地制止「伊拉克侵略」，是「一件能表明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的事」。但在今日世界的冷酷事實，在計算相對的國力時，除了軍事之外，還得算上經濟方面的表現。以這個標準而言，日本顯然是在「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而且「想扮演一個較

註③③ 中馬清福，「米世界戰略的變化と日本」，軍縮問題資料，一九九三年六月號，第四至七頁。

註③④ 一九九〇年美國駐日本沖繩的海軍陸戰隊司令官在華盛頓郵報公開表示：「美軍若撤退，則日本已經相當強大的軍隊，將更加強大，我們是個瓶蓋。」這是說美軍駐日，就如同阿拉伯童話中，將魔鬼封在瓶子內的蓋子一樣，可以防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路。

註③⑤ 張隆義，「後冷戰時期日本的防衛政策」，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一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一年八月，第四十八頁。

有份量的區域性角色」。³⁶

美國認為日本在美國的安全保障上，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夥伴過。從五〇年代的初期開始，兩國的安全保障關係是片面的，美國信守集體安全保障上的義務，日本卻連自身的防衛也不表熱心，日本的政府和國民只期待美國執行防衛日本的任務，對於防衛美國自不用說，對於防衛美國的國際地位，也從未認真的考慮過。日本只關心狹義的國家利益，而且其國家利益絕大多數是屬於非軍事性的。日本政府將防衛國家任務的人員部分委之於美國，美國則從日本獲得執行職務的報酬。

美國認為幾十年來，它承受了在亞洲防衛大半的費用，當然這對美國的利益有所貢獻，但對日本也有同樣程度的貢獻，而日本卻將不必花費在防衛上的資金用於強化它的經濟能力。³⁷

近年美國不斷要求日本能夠公平的分擔國際的責任。日本在今年四月二日所發表的外交藍皮書強調日本要更廣泛地參與國際重大問題的處理。有關全球規模的問題，「像過去那樣把問題的解決全部交給美國去作已經困難了」，現在已進入多國協商合作的時代。日本要發揮與國力相稱的領導力量。³⁸

今天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地區糾紛、民族糾紛、宗教矛盾、環境保護問題，都與國家的安全有關，而日本積極參與這些重大國際問題的解決，又都超越了日美雙邊關係的範圍，只依靠日美安保條約已經無法解決這些重大的國際問題。日美安保條約在冷戰結束後，其實質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了。

日美同盟關係雖已發生變化，但在近期內，這種關係還不會產生根本的轉變。在政治上，美國要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仍離不開日本的支持，日美同盟在維護亞太地區安全，保護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方面仍是不可替代的。而日本要加強自身的政治地位，成為政治大國，躋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行列，也少不了美國的協助。

在經濟上，日美間仍有著密切的利害關係，兩國互為重要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對象。儘管兩國的經貿摩擦相當激烈，終將在對立與協調中，彼此的讓步下，緩和下來。過去美國付出很大的犧牲，協助日本經濟復興，今天在美國經濟遭遇困難之際，日本也應該站在全球的觀點，負起經濟大國的責任，協助美國渡過難關。日美兩國維持良好的關係，將是亞洲安定的力量，也是亞洲民主國家所期望的。

註³⁶ 亞倫懷丁(Allen Whiting)、「美日口角摩擦難有寧日」，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第四頁。

註³⁷ エドワード・オルセン著，西岡公譯，「安保條約はもう要らない」，諸君，一九九三年五月號，第四四至四六頁。

註³⁸ 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第三頁。